

由空間移動視點探討陶淵明的 〈歸去來兮辭并序〉要旨

川 合 康 三*

摘 要

〈歸去來兮辭〉已是無須多加贅言的名作，然而，若以「空間移動」之視點重新解讀之，這篇作品將會產生何種嶄新的風貌呢？

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并序〉裡面，「辭」與「序」間有差異存在。讀過「序」與接續於後的「辭」，首先會注意到的便是在這兩部分中陶淵明的空間移動呈相互逆轉一事。在「序」中陶淵明的移動歷程是由離鄉任彭澤縣令卻不滿三月便辭官為止。另一方面，「辭」中的動向則是辭去彭澤縣令一職後歸鄉，過家居生活。簡言之，在「序」中是由鄉里到彭澤縣，「辭」中則是由彭澤縣到鄉里，兩者移動方向相反。也可說，在〈歸去來兮辭并序〉的空間移動中，作者將鄉里與彭澤縣間的往返分寫為「序」的「往」與「辭」的「返」。

首先，在兩者的空間移動中可看出曲折與直行的對比。在「序」離開鄉里往彭澤縣的旅程極富曲折性。但那與其說是實際移動行為的曲折，不如說是抵達彭澤縣為止心理過程的曲折。因空間移動的對比而產生的差異中最重要的便是兩者所描繪出陶淵明形象的差異。在「序」中之所以描繪出那樣懦弱的自我，其實是在講述在到達生存之道的漫長摸索。藉著在「序」裡描寫各種嘗試的自己而導出找到本來自我的「辭」。在這層意義上「序」與「辭」雖具連續性，但卻非一條線直接連續下來的，而是以極具正反性的方式構成。如由上至此的內容所述，兩者的陶淵明像是這般地具對照性。

* 作者係日本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教授。林欣慧中譯。

藉由空間移動此一視點重新解讀，明顯可看出〈歸去來兮辭并序〉是由裝扮成具對照性樣貌的一篇作品的序和本文組合而成的。

關鍵詞：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仕宦、隱逸、自畫像

一、前言：文學與「空間移動」

「空間移動」此一觀點在文學中之所以有效，乃是因為新的世界觀也是文學所應表現的事項之一，而「空間移動」則恰可成為發現新世界的契機。在居於定所營生的日常生活中，人們無意識地遵循著由過往傳承至今的習慣與思考模式。不僅是自己，處於周圍環境與生活圈的人們也同樣地遵循既定的行動模式，重複著同樣的行動。在這樣的生活中，由於自己與環境皆是固定的，因此安定的世界也使安定的生活方式受到保障，但卻也極少有新世界的出現。相對於此，人只要一離開其居所，便會暴露在外界劇烈的改變之中。也由於察覺到周遭世界的異質性，而不得不改變自己的對應方式，並因此與外在世界產生緊張關係。而由這樣的緊張關係產生的便是嶄新的世界觀。

近年來移民文學，抑或亡命文學之所以受到矚目也是因為移民與流亡者正是「空間移動」的極端體驗者。例如以宗教學者身分享譽國際的耶律亞德（Mircea Eliade）同時也是一名特異的小說家。Eliade 在地處歐洲邊陲的羅馬尼亞誕生，闊別祖國的他在以法語進行宗教學研究的同時，也以祖國羅馬尼亞的語言從事小說創作。對於身處異文化當中並以非母語從事研究的他而言，以母語從事創作難道不是一種為尋求精神世界的平衡而自然產生的需求嗎？被迫離開祖國並「移動」至異鄉的情況成為他創作文學的動機。不僅如此，對 Eliade 而言，與印度此一遠隔的文化圈間的關係也在其文學世界中發揮了巨大的效力。以印度為舞台的小說對西歐文化圈的人們而言充滿了困惑與魅力。那不僅限於和西歐文化相異的文化相遇，更由此產生出了現實與非現實間的混淆與融合。

還有馬圭斯（Garcia Marquez）等拉丁美洲文學受到國際文學界矚目也是和此有關。對於以西歐近代為中心的文化作為其底盤文化認知的讀者而言，拉丁美洲的世界本身便已是透過書頁的「空間移動」，然拉丁美洲文學的作者們實際上則甚為活躍地行動、移動，不停留於一固定的世界。就這樣在數

種文化不斷衝突而後融合的過程中，過往的文學中所無的新世界便由此誕生。

文學中出現這種由「移動」的視點來呈現的現象，換言之，在離開歐洲此一固定世界處產生嶄新優秀文學的現象，或可說是對西歐近代感到某種的窒礙、閉塞產生的必然吧。

而中國古典文學方面，其最顯著的特質便是使文學得以成立的通時性傳統與共時性環境是固定的。由西元前到二十世紀初為止這樣漫長地驚人的時間裡，中國文學始終維持驚人的均質性。此一文學的一貫性，其時間之長在全世界的其他文化圈皆無比類。為此，在中國的古典文學中，根本無由產生在二十世紀的後半於世界各地興起的躍動感強烈的移動文學。即便如此，在中國文化圈的綿長歷史中，因時代、地域不同而生的變化仍屢屢可見。例如西晉到東晉的移動便為中國正統性的傳統帶來劇烈的變化。其原因應是由於知曉了江南一地，使過去以中原為中心的世界以及在中原培養出來的傳統世界觀都不得不隨之改變。而在當地首次接觸到的南方的人們過去一直在和中原不同的風土中營生一事也令中原人感到新鮮的驚奇。知曉在過去的認知中無法掌握的空間一事不也激起了他們對異世界的興趣與關心嗎？事實上，在此時期誕生了許多以探訪異世界為內容的志怪小說，並結出了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此一文學上的果實。

有關六朝時代的南渡帶來何種變化此一大問題將作為今後的課題，在此僅試著極微視地思考在一局限範圍內的「空間移動」。在此要提出討論的便是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歸去來兮辭〉已是無須多加贅言的名作，然而，若以「空間移動」之視點重新解讀之，這篇作品將會產生何種嶄新的風貌呢？筆者試著由此一視點來探討之。

二、〈歸去來兮辭〉——「序」

《文選》所收錄的兩篇「辭」中，於漢武帝〈秋風辭〉的題名處標上「并序」，並載有總計三十字的「序」——「上行幸河東，祀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群臣飲燕，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¹。《樂府詩集》卷 84「漢武帝故事曰」除了「上」作「帝」，「燕」作「讌」外，也載有一字不差的

1 梁·昭明太子，《文選》（臺北：藝文印書館，1991），卷 45，頁 647。

「序」。
〈秋風辭〉是否真為漢武帝所作姑且不探討，但此「序」乃是第三者對於作辭的背景所做的說明，而非作者本身所寫一事是極為明顯的。

《文選》所收錄的另一篇辭〈歸去來兮辭〉方面，在《文選》中並無收錄其序。應是在編纂《文選》時編者將之刪去，抑或當時並無序的關係。倘若是後者的情況，視此序非陶淵明所作，在道理上亦是可成立的。李善在注裡引用了節錄自序的四十四字——

序曰，余家貧，又心憚遠役，彭澤縣去家百里，願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自免去職，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²

將之與今日可見的陶淵明集中的「序」相較之下，便可發現，李善所引用者除多出「又」「縣」二字與缺了「兮」一字外，完全是由陶淵明集中的「序」抽出的極小部分。李善讀過「序」一點是可確定的，而之所以未將全文載錄，應是因其過長的緣故吧。或者是李善認為「序」部分的文章與〈歸去來兮辭〉本文相去過遠而僅節錄了要旨吧。假設在編纂《文選》的時點已有了「序」，當時未收錄「序」的部分應也是為了這原因亦說不定。的確，「序」不僅過長，看起來與「辭」本文在性質上也多有差異。

指出〈歸去來兮辭〉本文與其「序」間有差距的是橋川時雄先生。橋川先生闡述道「〈歸去來〉的序和賦自己分為兩種意境。序非是直接連結至賦的序，而從其撰寫年代也可讀出成長年輪的年代差別」，並論道「序」是「義熙三年（407），陶淵明三十一歲左右」，賦則是「義熙十三年（417），推定他為四十歲上下」。順道一提，關於〈桃花源記〉，橋川時雄先生也論道其末尾所附的詩應非陶淵明所作。³

桃花源詩是否為偽作雖尚無法下定論，但指出〈桃花源記〉本文與詩之間有不同性質的感覺這點應是有其意義的吧！此外，關於〈歸去來兮辭并序〉，指出「辭」與「序」間有差異存在的意見也相當重要。然而，將其差異歸因於製作時期的不同既無根據，且本來將其解讀成「辭」和「序」便不妥當。視其為由序和本文相輔相成構成的作品，而且兩者的差異則是作者的特意創造之解釋方式應較貼近作品的本質吧！兩者產生差異之因首推空間移動的不同。

2 《文選》，卷 45，頁 648。

3 橋川時雄，〈讀陶淵明〈歸去來序〉——選自《箋陶私抄》〉，《二松學舍大學論集》（東京：二松學舍大學，1960），頁 1-22。

三、「辭」與「序」的空間移動

讀過「序」與接續於後的「辭」，首先會注意到的便是在這兩部分中陶淵明的空間移動呈相互逆轉一事。在「序」中陶淵明的移動歷程是由離鄉任彭澤縣令卻不滿三月便辭官為止。另一方面，「辭」中的動向則是辭去彭澤縣令一職後歸鄉，過家居生活。簡言之，在「序」中是由鄉里到彭澤縣，「辭」中則是由彭澤縣到鄉里，兩者移動方向相反。也可說，在〈歸去來兮辭并序〉的空間移動中，作者將鄉里與彭澤縣間的往返分寫為「序」的「往」與「辭」的「返」。

這樣移動的對比，不僅移動方向相反，且大幅與「仕隱」生活的對比重疊。「序」中談論「仕」，「辭」中談論「隱」。空間移動的對比不僅限於移動歷程的差異，也與生活方式的對比重合。在個別的描述中也安排了雖然細微，卻對文學極為重要的對比。

首先，在兩者的空間移動中可看出曲折與直行的對比。在「序」離開鄉里往彭澤縣的旅程極富曲折性。但那與其說是實際移動行為的曲折，不如說是抵達彭澤縣為止心理過程的曲折。

因貧困生活而苦惱時周圍的人勸自己出仕→（因此）也跟著興起那種念頭→（但是）沒有當官的門路→（但是）恰好四處興起一陣錄用人才的風潮，我也有了當官的機會→（但是）在亂世不想到太遠的地方去（但是）彭澤又不遠，也能拿到釀酒用的米→（所以）就決定出仕了→（但是）當了一下官馬上就覺得厭惡→（但是）想想還是再當個一年好了→（但是）剛好要舉行妹妹的喪禮，就藉這個機會辭了官。

試著整理一下「序」便可得出如上的梗概，在（）中補上順接與逆接語氣詞便可清楚了解其歷經數次轉折。若只簡單說出結論，便是離鄉到彭澤縣出仕一事，正如李善省略中間只節錄了頭尾般，僅需如此便可完全傳達其內容。即便如此，紀錄這般繁瑣的曲折過程便顯示，此曲折本身有其意義。

另一方面，「辭」中寫道：

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⁴

4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卷5，頁460。

由彭澤縣返鄉的輕舟迅疾如風地直線前進。輕舟的動作分明已如此迅速，自己的心情卻亢奮地連這樣的速度都覺得緩慢。與「序」中紀錄數次舉棋不定、徬徨無措的內容成對照的是「辭」中俊敏且目標明確的行動。

因空間移動的對比而產生的差異中最重要的便是兩者所描繪出陶淵明形象的差異。以下筆者想順著「序」的記敘檢視其內容。

四、「序」中的陶淵明

（一）生活苦

「序」由陶淵明生活的貧苦開始寫起。

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緡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⁵

在詩文中到處可見陶淵明過著三餐不繼的貧困生活。陶淵明實際上的生活究竟貧窮到何種地步並非問題，在讀解作品時必要的是了解實際上的生活與文章中所寫的貧窮間有多少差距，或者兩者間是否並無差距，以及書寫貧困一事與其描寫方式顯示出了作者什麼樣的態度與意圖等問題。

由於無從得知作者的實際情形與當時典型的生活，因此剩餘的問題便是了解作者談論貧窮的意義所在以及解讀可由其書寫方式窺得的作者對貧困的態度。

吟詠貧窮的詩作形形色色，例如〈擬挽歌辭〉其一的末尾如此寫道：

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⁶

並在其二的開頭寫道：

在昔無酒飲，今但湛空觴。⁷

讀及此，其連酒都匱乏不足的貧狀令人發噓。在這樣生死交關的嚴重情況下還特意提出飲酒不得足如此對生命而言微不足道的不甘，這樣的戲謔筆法是作者的意圖所在。這裡還加上了這樣的諷刺——成了喝不了酒的亡魂才有

5 《陶淵明集箋注》，卷5，頁460。

6 《陶淵明集箋注》，卷4，頁420。

7 《陶淵明集箋注》，卷4，頁423。

人會獻上盈觴的酒。⁸

也有想一時性地逃避貧苦的詩句。〈雜詩〉其八中在敘述衣食不足的苦狀後，作出結論詠道：

理也可奈何，且為陶一觴。⁹

認為若這是「理」那也無可奈何，末了吟道且飲一杯暫時忘卻貧困之苦吧。或還有〈贈羊長史〉詩中寫道：

駟馬無賞患，貧賤有交娛。¹⁰

逆轉貧富之觀，安慰自己道富貴者無法由憂苦中得到解放，但貧苦者卻偶有樂事。

雖非全無如上面列舉的兩首詩般講述一時逃避心理者，但較常見的還是憶起貧困交迫的古人，並將自己與之形象重疊的詩。在〈飲酒〉詩其十一中舉出顏回、榮啓期這般的仁者、有道之士死後雖留其名生前卻充滿苦難之例，導出欲稱心，除在生之時本人滿足自己外別無他法的結論。

〈詠貧士〉的七首詩是以貧窮為主題的系列詩作。可說是七詩之序的第一首詩中在書寫了孤獨與貧窮後如此詠結：

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¹¹

嘆道若沒有人能與自己共談貧窮，則悲也無益，並在第二首詩的最後兩句寫道：

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¹²

想在古之賢者中尋求「知音」。接著在第三首以後的詩中一面接連列舉過往的貧困之士，一面藉追憶這些先賢在不遇的人生中依然不改其志的事蹟替自己求得慰撫。

8 關於「以貧窮為主題的文學」，福井佳夫在〈論揚雄〈逐貧賦〉〉（《六朝的遊戲文學》，東京：汲古書院，2007）中對「成為先驅」的揚雄之〈逐貧賦〉所具備的滑稽性及與其相關的系譜有所論述。

9 《陶淵明集箋注》，卷4，頁353-354。

10 《陶淵明集箋注》，卷2，頁161-162。

11 《陶淵明集箋注》，卷4，頁364。

12 《陶淵明集箋注》，卷4，頁366。

這些舉出貧苦度日的高潔之士的詩中共通的一點便是：藉由提出比物質價值更具價值之事物來克服貧困的態度。自古以來貧窮便與高潔的精神相繫。

然而，在〈歸去來兮辭〉的「序」中完全無法由其描述的貧苦中看到賦予貧困意義的態度，也無法看到將物質上的貧乏與高潔的生活方式相結合的態度。這裡的貧困只限於金錢面的、生活上的層級。簡單地說便是，不過是在講述光靠自己的田地無法養育一家這樣子的生計困難罷了。而自己也因為那份貧困而不得不仕官。

也非全然沒有詩作在詠嘆貧困時不為其另附加價值。〈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詩中娓娓道出自己自年輕時的不幸與貧困，一面詠嘆自己的悲慘人生一面向龐、鄧兩人尋求同情：

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結髮念善事，僂俛六九年。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炎火屢焚如，螟蟻恣中田。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廛。夏日長抱飢，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願鳥遷。在己何怨天，離憂悽目前。吁嗟身後名，於我若浮煙。慷慨獨悲歌，鍾期信為賢。¹³

這首陶淵明集中唯一一首的樂府詩仿古辭〈怨詩行〉¹⁴由「天德悠且長，人命亦何促」詠起，但相對於樂府古辭中對比天壽的永恆與人生的短促並由此厭恨人生短促，此詩開頭雖同樣提出天與人之間的關係，卻說兩者無相關關係。無論是天道還是鬼神對人類而言都是不可知的存在。在天眼之下勤於行善 54 年卻沒有任何的報償。二十歲時遭逢晉末的動亂，三十歲時喪妻。旱災，伴隨而來的蟲害加之以暴風雨。由於歉收而無法免於飢寒交迫的苦痛。在這樣日復一日的艱困生活中只能不斷祈求時間過得快一點。陶淵明在其他詩作中對於人終究難逃一死一事曾數次發出那麼沉痛的吶喊，卻在此作中一反常態地祈求生命的沙漏加快速度。而後在回顧充斥著不幸與苦難的一生時卻不將之歸咎於天反而自責處也不合道理，看起來也似乎與開頭的兩句相齟齬，但彷彿是在說給陷入痛苦深淵的自己聽一般，作者意欲直接承受那份不合理。貧困也是能獲得清貧之士名聲的條件。但問題在於現在的現實，死後的名聲根本無意義。詩的最後作結道希望這首哀歎之歌能有如鍾子期一樣的知音了解。對於身處無法逃脫的不幸泥淖者而言，能理解自己處境者的

13 《陶淵明集箋注》，卷 2，頁 108。

14 宋·郭茂倩，《樂府詩集》（中華書局，1979），卷 41，頁 610。

存在是勉強殘存的救贖。

這首詩主要講述的是家境之苦，為貧困附加意義的意味極薄。豈止是薄，由否定身後之名這點也可了解到，陶淵明甚至像在否定貧困帶來的意義。而貫串全詩的是在這般艱苦的人生與貧苦的生活中油然而生的嗟嘆。這首「怨詩」只是一味地吟詠自己對生命的悲嘆。

然而，在〈歸去來兮辭〉的「序」中雖也講述貧窮，卻連悲嘆聲都不聞。不加入感情，僅是像在談別人家的事情一樣地澹然寫出三餐不繼的生活。在這開頭處已表現出「序」的書寫性格。雖是寫自己的事但卻排除一切思慮。

（二）出仕為止

「序」在描述貧困之狀後還紀錄了到出仕為止的經過：

親故多勸余為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為德，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為小邑。于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稅，過足為潤，故便求之。¹⁵

這段記述在短短的文章中穿插了數次轉折。一一細述到就任彭澤縣令為止的迂迴曲折。「脫然」並非表達其「毅然決然」的果斷態度之詞。在〈飲酒〉詩其十七中「清風脫然至，見別蕭艾中」所詠的「脫然」恰似形容風颯然而起，這裡應是用來形容其糊裡糊塗地聽從別人的勸說就興起那種念頭之意吧！出仕一事不是自己毅然決定的。雖然順著旁人所言也毫無主見地跟著那麼想，但是，雖想當官，卻無門路，該怎麼才能成為官員呢？——在這樣的敘述中浮現的人類樣貌著實是名沒有自發性行動的確切信念，且既輕率又無法作出現實性的判斷與行動的愚蠢至極的男士。全篇的「序」都是要呈現一個毫無主體性、漫無計畫的人的樣貌。

「會有四方事，諸侯以惠愛為德」兩句是指意欲雄霸天下者想藉由延攬隱逸之士來彰顯自己權威的當時情勢。釜谷武志先生對於這股風潮有如此的記載。

而且在東晉末這個時期辟召隱者之風更甚於任何時代。話說回來隱者出仕一事本就是彰顯當時王朝有多麼國泰民安的絕佳證明。雖說應自後漢起這股風潮便已開始盛行，但說最盛期是從東晉到劉宋的這段時期也應非過言。¹⁶

15 《陶淵明集箋注》，卷5，頁460。

16 釜谷武志，〈關於〈歸去來兮辭〉的「辭」〉，《中國文學報》61(200): 1-18。

在反而是出仕的好時代卻作如是說法，陶淵明諷刺的態度頗為明顯。東晉末期的混亂本是可歎的事態，但在此文中認為諷刺的是，由於世局的不安定反而使得本來無法被提拔的陶淵明也有了仕官的機會，並橫眉冷嘲道掌權者錄用人才不過是為求大義名分。從此一文可感受出作者清冷的眼神幽幽地閃爍著。

雖說因「家叔」的關照找到了出仕的管道，但在陶淵明本身的動機中所舉出的卻只有極為消極者。離鄉里不遠，酒大概也能到手等事——在開頭明明陳述了需要米糧這樣迫切的動機，一旦要就任了卻又舉出不值一提的理由，說得好像意願不強的樣子。

在舉出的出仕動機中有初段所說的尋求生計以及這段說的離家距離和酒錢有了著落等事，雖在迫切性上有所差異，但無論哪一者都是屬於陶淵明極個人的理由。就像是完全不存在似地，對於就任行政職務的意義、要在職位上盡力的抱負等這種面對社會的態度一律不碰觸，故意只列舉個人的理由。

不過，在出仕之際不高談積極意願的情況不只在出任彭澤縣令發生，在為了到鎮軍將軍劉裕身邊出仕參軍一職而前往京口時所作的〈始作鎮軍將軍參軍經曲阿作〉詩中也同樣地，與旅程方向成反向的思家之情由頭至尾縈繞不去。只是在這首詩中他寫道：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¹⁷

由自己雖貧仍自給自足，心在世外詠起，並如其在結尾詠道：

真想初在襟，誰為形迹拘。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¹⁸

如同這些詩句所吟詠的，此次出仕不過權宜之計，自己的真心仍在他處未曾動搖，陶淵明不談對職務的意願，卻不斷像在說給自己聽似地一再反覆表明自己仍保有堅定的信念。

一再重複「山澤之居」、「班生之廬」方為自己本來居所的這首詩中，雖強烈流露出對赴任一事的沉重感，但自己的信念絕無動搖。另一方面，「序」中其判斷與行動雖有所動搖，但卻不見有講述心情方面迷惑的文句。雖說如此，在這裡的毫無迷惑並非是因其保持自我信念的關係。甚至連迷惑

17 《陶淵明集箋注》，卷3，頁180。

18 《陶淵明集箋注》，卷3，頁180。

該出仕還是在家閒居都沒有，僅僅只是描述其順著周圍人們的話隨波逐流的歷程。因為沒有強烈到會感到迷惑的自我意識，因此既無糾葛也無懊惱。

（三）從就任到辭官

下一段落中描述就任後便立即感到嫌惡乃至終於辭職的過程作結：

及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饑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尋程氏妹喪于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兮。乙巳歲十一月也。¹⁹

陶淵明的思緒在此千迴百轉。雖心生「歸與之情」，卻不立即辭官。心想再等個一年，但恰巧碰到妹妹的喪禮要舉行又變得歸心似箭。就像就任的契機是旁人的勸進，辭官的契機也是要舉辦妹妹喪禮這樣偶發的事件。本身還是缺乏自發性的行動。「何則」一節中雖講述陶淵明原來想順應本性而活的哲學，但因其寫道「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後又接著打算延個一年再打算而寫道「猶望一稔」，與其說是言志不如說文脈又回到在描寫一個優柔寡斷的人類形象。若不將「一稔」單純解釋為一年，而將其解釋為穀物熟成之意的話，便會令人想起一則軼聞，²⁰ 那便是陶淵明本欲在能成為收入的公田上清一色種植釀酒用的秫稻，卻因妻子的反對而不得不撥出五分之一空間種植可作為糧食的秔。如果想成作者打算等下一次稻米熟成拿來釀酒後再辭職的話，便更增添了一股滑稽到可悲的感覺。

如眾所皆知的，《宋書》〈隱逸傳〉的陶淵明傳中紀錄有在辭去彭澤縣令之時痛快淋漓地斥罵對方道「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

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²¹

這裡是陶淵明讓讀者一窺其厭惡庸官當道的反骨真面目的重點場面。如此描繪出的陶淵明形象與陶淵明自身在「序」中描繪出的身影著實形成明顯的對比。相較於在陶淵明傳中彷彿將辭呈拍案而去地寫著「即日」，「序」中時

19 《陶淵明集箋注》，卷5，頁460。

20 梁·沈約，《宋書》（中華書局，1974），卷93，頁2287。

21 《宋書》，卷93，頁2287。

而想辭職，時而又想再延個一年，但最終還是以妹妹的喪禮為契機而辭官，毋提即刻了，所描繪出的完全是一名拖泥帶水優柔寡斷的男子。而且也沒有什麼行動的基準，只是在周圍情勢的牽引下隨性行動。流傳後世的陶淵明形象是果敢解印而去的，在「序」中與此成反比的形象常易被忽略。但至少陶淵明在「序」中試圖將自己的形象描繪成這樣不可靠的男子。在此可浮現而出的是一名既無生活能力也無確切信念的滑稽男子，其形象甚至到了帶著戲謔意味的地步。

究問陶淵明傳中毅然貫徹自我意志的陶淵明與「序」中優柔寡斷的陶淵明，何者才是真實的陶淵明並無意義。只要聚焦於無論是哪一個陶淵明，都各自形象化為具備鮮明色彩的人類樣貌一事即可。

在「序」中的陶淵明只能說著實是一名不足倚賴的人，但若提到描寫以人世間的尺度來看無可救藥的人，也必須列舉〈責子〉一詩：

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²²

這便是陶淵明的五個兒子。他雖一一列名嘆道淨是些不好學又不成材的孩子，但卻也是典型隱含言外之意的例子。陶淵明表面上雖然煞有介事地說道對於淨是不成材的孩子一事感到絕望，除飲盡杯中物外別無他途，然而在寫出每一個人的懶惰樣子時卻在字裡行間流露出對於這樣的孩子感到可愛得不得了的真情。而在文中洋溢著那份為人父母對孩子的憐愛，對今天的讀者而言也依然深有同感。

陶淵明站在世俗這一方感嘆由世俗標準看來無計可施的孩子們那無能的樣子。但在一一描述孩子們是如何不成才的過程中，卻具有以和世間標準不同的磅秤來確實地掌握住小孩重要性的另一雙眼。假托敘述不成才孩子們的文字背後確實有此一價值觀。

不過陶淵明的詩作尚有〈命子〉，此作中他由堯開始說起陶氏一族的家系，自豪地講述一門之中賢者輩出，屢為世間立下功績，並將出生於如此顯赫之家的長男命名為「儼」，吟道「願爾有此才行」。將〈命子〉、〈責子〉兩者的詩題並排觀之，會發現無論是敘述出生時是如此寄予厚望，然而實際

22 《陶淵明集箋注》，卷3，頁304。

上卻成為如此不肖之子的內容，或作者本身以嘲諷的態度寫出的〈責子〉之詩，都是喜好自虐性戲謔的陶淵明可能做的事。這姑且不談，陶淵明也有像〈命子〉那樣標榜正經價值觀的詩作，另一方面，正因其具有這樣的價值觀，在捕捉「序」中的自己以及〈責子〉詩中的孩子這般於世無用的人時，那與之相異的價值觀才更顯得鮮明不是嗎？

（四）無用者的系譜

小孩是怠惰學業（〈責子〉詩），大人則是沒有常人的生活能力（〈歸去來兮辭序〉），陶淵明雖將自己與孩子都描寫成世間無用之人，然而在陶淵明之前也非沒有將自己描寫成無能、無用之徒的例子。

首先是嵇康的〈與山巨源絕交書〉²³。一般對這部作品的理解是，相較於山濤在獲授選曹郎一職時推薦嵇康代替自己，嵇康卻因憂慮會將山濤捲入權力鬥爭的漩渦中打算與其「絕交」而寫了這篇文章。在文中嵇康列舉出自己究竟有多麼不適合官場的原因。「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必不堪者七」的頭項是，一旦當了官就無法睡到日上三竿一事。第二點是，無法悠遊於自然之中。第三點是會被迫正襟危坐，衣冠整齊地低頭行禮。第四是自己連寫信都感到厭煩卻得被迫處理成山的公文。第五是得強迫自己遵循弔唁等社會的習俗。第六是被捲入凡夫俗子的紛擾。第七是無法免於實務工作的繁瑣。「甚不可者二」其一是自己離經叛道，其二是自己生性耿直無法對不正之事妥協。大體上這九個理由的順序規則是先由個人的、私人的性情漸談及公家性質的不適任，再進而談及與其說是性格不如說是主義性質的理由。他所執拗列舉出的每一個理由都像是在誇示自己於官場而言是一名無用、無能的人一事。在書信中更連生活中細部的邈邈都列舉出來：

……性復疏懶，筋骸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²⁴

嵇康在此列舉出來的是，覺得日常生活中的基本生理行為麻煩而不做的事例。這些例子之所以能表現極端的懶惰是因為，連洗髮、排尿等不僅必要且能令其舒心的行為都覺得痛苦而不執行的關係。也就是說，他想藉由表達這不是

23 《文選》，卷43，頁612。

24 《文選》，卷43，頁613。

爲了得到舒適便利的懶惰，而是到了連動作能帶來的舒心都盡可能延遲，寧願忍受痛苦的懶惰來說明沒有更甚於此的懶惰。

嵇康在列舉自己不適合爲官的性質裡言及這種生理層次的事是因爲，這份書函裡有多重的偽裝，而這是其多重偽裝中的一環敘述。即便是在這樣的文脈中產生的，以不同於謙遜的態度列舉出自己的無能這點，顯示了一種嶄新的自我表達方式。幽默地將無能誇張化、滑稽化的這篇文章應可算是在文學中自我戲謔化的最早例子之一。

嵇康的懶惰行狀與世人稱道的勤勉生活相互對峙。特別是在儒家文化中不缺少講述刻苦向學的軼聞。但無論美談佳話如何當道，就文學主題而言，比起勤勉懶惰反而更具發展空間。後世的文人以嵇康的懶惰爲始，將吟詠「慵」然的自己一事代代傳承。正如在處世之道中「拙」具備與「巧」相對的價值，「慵」也因與以尊崇精勤的世俗觀念相左而伴隨負面的價值。不過，嵇康本身並未對自己的懶惰賦予任何意義。只是一味地否定。

在嵇康之後約半世紀，葛洪也在其《抱朴子》外編〈自敘〉中「全方位」地寫出自己的無能形狀。自孩提時代便讀書、作文、武藝、遊戲皆不如人。成人之後也風采不揚，家境清貧，不擅交際而湮沒無聞。雖說在葛洪執拗地將自己身爲社會邊緣人的劣等狀列舉出來的背後似乎隱藏著莫名的優越感，但至少在表面上他並沒有將自己的無能轉向肯定意義的主張，僅是一味敘述愚昧又拙劣的自己。²⁵

陶淵明在〈歸去來兮辭〉的「序」中將自己描寫成沒有自主性，只是混日子過活這點也與嵇康、葛洪的無用者系譜相關。他們的文章裡都沒有肯定無用者的口吻。只是一味列舉自己是如何的不適任，如何的無能。但即便未公開提倡主張，在書寫無能之人的樣貌這件事本身即表明了與世俗，乃至官界的價值觀相對峙者的立場這一點並無不同。藉由將自己規範爲和社會上有用、有能者不同的人，也就是社會的失意者，並用文學表現出與既定價值觀不同者的人味。

即便描寫無用者形象化了人類的嶄新姿態，但在此必須不斷提醒的是，嵇康、葛洪，以及陶淵明自身沒有無標榜其價值。在後世「慵」固定成爲文

25 關於葛洪的〈自敘〉，請參照川合康三，《中國の自傳文學》第二章（東京：創文社，1996）。

人的一面之前的語言中，藉著不摻入任何意義描繪出人類的多樣性，而這會比描述俊敏的人更能創造出富文學魅力、活生生的人類樣貌。

五、結論：「序」與〈歸去來兮辭〉本文

〈歸去來兮辭〉本文中充滿了在決定選擇與自己相合的生活方式後的歡欣之情。在從彭澤回鄉的途中亢奮的心，接受孩子們與男僕的迎接進入家門的喜悅，以及在那享受每一天生活的滿足。在此他將在有限的一生中打算不違己志，與自然化爲一體而活的想法和具體的生活場景一齊描繪出來。如果本來是因生計困難而仕官，則辭官後勢必又得面臨同樣的困苦生活，但他捨卻實際生活的表象，找出自己的生活方式，文中便洋溢著他實踐那樣生活方式的歡欣與決定貫徹自己信念的開朗。

在「序」中描寫無自主性隨外界情況而動的人，在「辭」本文則享受適合己性的生活方式。兩者看來著實形成明顯的對比。然而在「辭」的部分他依然並未借用某些觀念爲自己選擇的生活方式附加意義。舉陶淵明的歸田來說，「歸田園居」五首也同樣沒有大加標榜隱逸的主張。其一由下兩句開始：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²⁶

正如其所呈現的，只不過是在談論隱逸與個人的性質相合與否。「序」的「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辭」的「既自以心爲形役」是在講述打算一改至今爲止的生活方式，順「心」而活，而非藉由外在和仕宦對抗的觀念來主張之。在此所說的「心」，與其說是精神，似乎作心情、心境一類的解釋較佳。在「辭」中重視自己的心情，欲順之而活的陶淵明與「序」中隨人言而動，忽然想從官，卻又在從官後頓感厭惡的陶淵明，兩者在隨心而活一點上並未斷絕。只是，在「序」中的心情是順著外界的動向隨波逐流，在「辭」本文中則是發現了自己的心情。尋得自己本身的真心，不再隨外界起舞——與「序」鮮明的對照由此而生。

陶淵明並未敘述仕宦生活中何事讓其產生違和感，只是寫道讓其產生嫌惡感，但自官宦生活解放後得到的，是私人生活中的舒適。這便是在之後白居易特意提出並命名爲「閒適」之類者。在每天的生活中感受到的小小幸福——

26 《陶淵明集箋注》，卷2，頁76。

—陶淵明文學的意義在於以自己深深的思念證明這份感情。也就是說，有限的生命是人類無法擺脫的宿命，在接受這份有限性後想活出無憾的人生。正如之前引用了一部分的樂府古辭〈怨詩行〉也吟詠過的，將人生的短促與自然的永恆相比而慨歎之已然定型。陶淵明所以特異便是因為他不對比之，而欲將生必有終視為自然中的一部分，視其為必然且自然之態度：

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²⁷

若將此「感」解釋為因對比謳歌生命的自然與大限將至的自己而產生的悲哀，則將與陶淵明的思念相左。說到「悲」或「歎」，則的確與對比自然與人類的既定悲觀情感相同。草木欣喜地綻放花朵，泉水開始淙淙流動。由於察覺有生命者欣欣向榮，萬物皆在時間流動中盡情地展現生命而感到因自己也身處時間的洪流中，所以不久也會走到生命的盡頭，故而心懷感慨。或悲或歎，或與之相反地或放棄，或頓悟，心緒不定於某一方向而動，而要表現所有這樣的心緒動向除使用「感」外別無他詞。

「感」包含了錯綜複雜的各式思緒，而下一段中彷彿想擺脫之似地續寫道：

已矣乎！寓形宇內能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遑遑兮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²⁸

言「已矣乎」，一吐因「感」而生的萬千思緒，接著像在說服自己一般繼續論述。如此導出的是對這副不久於人世的肉體不加執著。不汲汲碌碌追尋某些事物，並否定富貴等的世俗價值觀，也不對仙界等的其他世界存有奢望。所求的是在日常生活中悠然自得地過活。總結道想過著這樣的生活——由自己順應萬物的變化，委身於之，朝向死此一自然的終點，將之理解為授與人類的天命，且樂於此天命而不徬徨迷惑。

不視生與死為對立的存在，而是藉著將死解釋為由生必然導向的結局，到達不抵抗死亡，與世界萬物同化，並欲委身於之的生存之道。

在「序」中之所以描繪出那樣懦弱的自我，其實是在講述在到達這樣的生存之道的漫長摸索。藉著在「序」裡描寫各種嘗試的自己而導出找到本來

27 《陶淵明集箋注》，卷5，頁461。

28 《陶淵明集箋注》，卷5，頁461。

自我的「辭」。在這層意義上「序」與「辭」雖具連續性，但卻非一條線直接連續下來的，而是以極具正反性的方式構成。如由上至此的內容所述，兩者的陶淵明像是這般地具對照性。更甚者相較於「序」中藉著仔細入微的描述其紆迴經過作出彷彿極為貼近事實的記述，「辭」乍看之下雖用具體且日常性的筆法，但卻表現出了由實際生活昇華而得的一個作品世界。

藉由空間移動此一視點重新解讀，明顯可看出〈歸去來兮辭并序〉是由裝扮成具對照性樣貌的一篇作品的序和本文組合而成的。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宋·陶淵明，袁行霈注，《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

梁·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梁·昭明太子，《文選》，臺北：藝文印書館，1991。

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

二、近人論著

(日) 川合康三 1996 《中國の自傳文學》，東京：創文社。

(日) 釜谷武志 2000 〈關於〈歸去來兮辭〉的「辭」〉，《中國文學報》61: 1-18。

(日) 福井佳夫 2007 《六朝的遊戲文學》，東京：汲古書院。

(日) 橋川時雄 1960 〈讀陶淵明〈歸去來序〉——選自《箋陶私抄》〉，《二松學舍大學論集》，頁 1-22。

An Exploration of the Main Meaning of Tao Yuanming's "Return" and its Forewar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bility

Kawai Kozo*

Abstract

Mobility has influenced changes in what would otherwise be a very homogenous literary tradition in China. The present study focuses on a specific instance of mobility, namely, Tao Yuanming's 陶淵明 famous piece "Return 歸去來兮." While this work has been read and researched for centuries, a re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bility" reveals a new facet to the work—there is a difference in direction portrayed in "Return" and its foreward. In the foreward, Tao Yuanming is leaving his home to assume the post of Pengze 彭澤 County Magistrate, from which he resigned after just three months. In "Return," however, he is returning home after his resignation.

This difference in direction also reflects the opposing lifestyles of government official and recluse.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while the foreward meticulously reflects a sense of reality, "Return" on the other hand has hidden between the lines a sense of the surreal and transcendental. Thus the two pieces work with and against each other to portray yet another aspect of Tao Yuanming's world.

Keywords: Tao Yuanming, "Return", official, recluse, self-portrait

* Kawai Kozo is a professor in the Faculty of Letters, Graduate School of Letters at Kyoto University, Japan.